

11.06

绍兴党史人物传

中共绍兴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89

绍兴党史人物传

编 审 顾 玲 菊

马 柏 生

主 编 王 文 全

中共绍兴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1989年10月

绍 兴 党 史 人 物 传

中共绍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绍兴市延安路200号)

国营绍兴华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25·插页5·字数172千字

1989年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越都英烈
名垂千古

薛驹



一九五二年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薛驹题词)

革命先锋

一九三九年七月 杨源时题

（杨源时同志于1939年任中共绍兴县工委书记，现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一代
贤烈
两袖
清风

马岳樵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

（绍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岳樵题词）

弘揚革命精神
振奮建設熱情

錢寶榮

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

（绍兴县县长、县委副书记钱宝荣题词）

序

绍兴县是江南的一个美丽古老的水乡。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著称于世，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早在1922年，绍兴县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3年建立了第一个中共绍兴地方支部，1926年成立了第一个中共绍兴地方委员会（即绍兴县委）。绍兴是浙江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一个地方。绍兴新的革命斗争史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多次发生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妇女运动，并且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尤其是与萧山衙前农民运动联合在一起的绍兴农民运动，其时间之早、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众，都为当时国内所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绍兴是浙东游击纵队创建和主要活动地区之一，它由浙东人民子弟兵解放的一座县城。

自从1922年绍兴有共产党的活动以来，无数的革命志士在这块越都故地上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壮诗篇。绍兴有今天，绍兴人民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呵！

饮水思源，我们永远也忘不了1949年5月7日这个绍兴解放的日子。这一天，绍兴人民获得了新生，绍兴古城焕发了生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推翻了压在绍兴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挣脱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精神枷锁。全县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

雄气概，艰苦创业。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县人民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绍兴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88年，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到60.4亿元，比解放初期1949年的8484万元增加了69.3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已从解放初期1955年的86.2元增加到1988年的1095元，增长了¹1.7倍。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县有22个乡镇实施了九年制义务教育，19个乡镇建造了影剧院，有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饮上了清洁水，共建有自来水站682座。全县62个乡镇已于1987年乡乡通公路。农民的吃、穿、住、行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昔日的平房、茅屋已为一排排崭新的红砖楼房所替代。在绍兴这块由革命先烈开辟的1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画出了历史上最新、最美的画图。

抚今追昔，缅怀先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及办公室编纂出版《越都风云录》和《绍兴党史人物传》两本书，以此作为绍兴解放和建国40周年的献礼。

现出版这两本书的目的，为使绍兴人民、共产党员了解过去，了解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真谛，从而永远不忘记过去，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捍卫和发展今天的胜利成果，把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把绍兴县建设得更加繁荣、更加美好！

陈礼安
1989年10月12日

目 录

序.....	陈礼安 (1)
周恩来自传.....	(1)
周恩来传略.....	(14)
鲁迅传略.....	(26)
徐梅坤简介.....	(33)
王若真简介.....	(42)
庄文恭传略.....	(49)
张秋人烈士.....	(57)
何赤华烈士.....	(70)
金世桢传略.....	(90)
黄超裳传略.....	(102)
邵力子传略.....	(114)
梁茂康传略.....	(125)
崔可登传略.....	(127)
曹素民烈士.....	(130)
沈素烈士.....	(147)
范文澜传略.....	(148)
张宗麟传略.....	(155)
黄敬传略.....	(167)
王文祥传略.....	(177)
马青传略.....	(187)

诸敏简介	(195)
王明远简介	(211)
史济中简介	(221)
刘民烈士	(229)
何志相烈士	(235)
朱铁群烈士	(238)
叶向阳烈士	(239)
杨浩友烈士	(243)
陈苏亚烈士	(245)
戚善康烈士	(246)
杜泰荣烈士	(248)
周建民烈士	(249)
禹双喜烈士	(250)



周恩来自传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的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

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1898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3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35岁时即患肺病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50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10岁、11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貽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

《再生缘》等七词唱。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8岁到10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

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满洲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6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13至14岁。

15岁（1913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

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当主席。1915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留学一年半。

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党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1920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20多人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中国少年共产

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300多人，包括法、德、英、比4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100多人。1923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锦琪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1923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1924年夏天即返国。

*

*

*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基太深。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14条民主主张。但中

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作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

“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80%到90%，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1911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